

紀錄十年，

張婉婷

十年有多長？是一個女孩銳變成少艾的歷程，對只爭朝夕的人來說或許很漫長。但對導演張婉婷來說，卻是眨眨眼歲月便被偷走，若不趕忙記下，很多真實的建築物、人物、事情、甚至時代，都會隨年消逝，「趁仍在就拍下它，在菲林（電影）裡，有些事是可以永恆地活著。」她是如此篤信。

讓消失的人事

永恆活著

十年，剛好是張婉婷拍攝和製作最新紀錄片《給十九歲的我》的時間，她與團隊拿著攝錄機記錄了六位英華女學校的女生，六年內經歷校舍搬遷、成長、家庭、友情、愛情等等，一個個生命毫不修飾地盡現人前，甚至不經意地側寫了時代的巨浪，用最幼嫩的眼睛，見證一座城市如何變得面目全非；填滿少女心事的日記簿，避免不沾上社會的浪花，但慶幸導演懷著傻氣又真誠的心，將青春的殘酷永久保存。

沒有品學兼優 只有愛的教育

高《給十九歲的我》的原委是，位於羅便臣道的英華女學校於2011年時計劃拆卸校舍重建，時任校長石玉如便邀請校友（即少女們的師姐）張婉婷把事情記錄下來。這班千禧寶寶剛好在舊校唸一年書，便匆匆從清幽的半山被趕往車水馬龍的深水埗暫時校舍，他們適應嗎？成長中會遇到甚麼事？社會發生甚麼變遷？然後，在他們最後一年待新校舍建成，他們又會搬回來……在無間斷的離離合合裡，好看的不是校舍多宏偉，硬件多風光，而是見著一堆生命像一片吸水海綿，嘗了很多人生第一次，傾盡所有，然後像我們大部分成年人一樣，吸收了很多挫敗和課堂，流了很多眼淚——片裡有抽煙又被同學欺凌的阿余；經歷父母離異後來遠走美國的「香港小姐」；努力代表香港出賽但路上事與願違的單車運動員馬燕茹；六位人物各有性格和稜角，但唯一共通點就是，和名校女生的刻板形象扯不上半點關係，是一般主旋律的校園片、勵志片不會告訴你。

這種選材，與導演張婉婷的靈巧的觸覺有關，「一開初，學校給了我們50個學生作選擇，你知啦，每個人中一時都『成住某』（懵懵懂懂）咁，我叫他們寫一封信給19歲的自己，寫一些憧憬和理想。」張婉婷用著舊式廣東話可愛又絕核的腔調解釋道。這個看似實用的起點，最後成了電影的片名，張婉婷從中挑選了30個女孩，都是認為有趣而有故事的，其後請她們到會議室聊天和自我介紹，「例如，片中的『香港小姐』，我跟她說，你那麼想做香港小姐，你學她們走路來看，怎知她『踢踏踢踏』，

腳擺吓擺吓，又真的懂怎走路。」有另一個女生，寫信時將每隻字縮在格的左下方，她覺得那人或許很自卑，特地約她聊天；「我記得，片中的阿余更索性缺席那次的訪問聊天，你看她多高傲和自我，但我看她寫的信、她的履歷，就索性讓她直接入選了。」是的，阿余是第一個出場的角色，片一開首就剖白和父母不知，一邊孤獨地吃晚飯，一邊自爆曾經郁手打母親，看得人特別揪心，也見導演特別有感覺。

當女孩升上中三，他們篩選了一批，最後剩下12個，一直跟拍直至畢業。還是好奇，裡面有那些品學兼優的學生嗎？「有一個，你記得那位 Head Prefect Shirley 嗎？」電影裡，Shirley 是種品學兼優、英語流利的高材生，張婉婷拍攝她，是因為她後來發現她在包庇和她南轅北轍的好朋友阿余，幫她在摘名表上做手腳刪掉名字，「我很被觸動，她成績這麼好，但她絲毫沒有看不起阿余。一個人好，不在於品學兼優，而是在於對別人有完全的包容，即使對方被他人批評、學問又不及你好，這才是真正的教育。」她形容，千萬不要誤會，她不是在替英華女學校拍宣傳片，她得到校長承諾，擁有影片的最終刪剪權（right of the final cut）：「這電影不是要表現到英華的學生有幾叻，因為我母校從來無監我們要讀很多書，以前成績表都無寫名次。讀書的目的從來不是成績好，而是等你找到自己的路，find out 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。」

其實，英華也孕育了她不一樣的成長歷程。從前小時，她會在黑板上亂寫粵語片的情節，作好多故事，老師發現後才急忙擦掉；又試過去宿營約同學午夜外出探險，被老師發現後嚇混過關，直至中四，她的父親過身，沒錢交學費，差點被迫退學，「是老師幫我找獎學金、助學金，才能讀下去，否則分分钟要做舞女或工廠妹。」其實不只是金錢支援，而是讓她有尊嚴地活著，「那時，有個外國人老師叫我教她中文，教她讀一些生字，便請我吃晚飯，我長大後才知道，她是怕我自卑不直接給錢，反而說成工作，再給人工。」她自覺有點像阿雀，但又沒有那麼擾攘，怎樣說，都是一個樂觀又開心的童年。





放下導演身段 做個有感受的樹洞

《給十九歲的我》是一項艱巨的工程，不但要挖開女生的心房，而且歷時十年之長，花了六年拍攝，三年剪接，近一年後才放映，少點毅力也會差點難產。電影裡呈現了，女生升上了中三，集體發脾氣擋鏡頭，不讓團隊跟拍，她感到很為難：「校長都有問過我，要不要放棄？我說唔好啦，開始了嘛，it's a point of no return，好在，我都唔係一個容易放棄的人。」她親身上前向女孩解說，又安排一些她們感到有興趣的活動，例如回舊校舍參觀，看著她們唱歌畫黑板，才從旁拍少許畫面，也不敢問太多問題，「從前做導演，你主宰了演員的生死，有做上帝的感覺，去到片場，無人會鬧你。但今次真的比女孩『鬧到飛起』。」她說，孩子一罵就是絕不留情面，慢慢令她意識到要放下自己的身段，做個謙卑的人，才能走入他們的生命，「他們不知道甚麼叫導演，無看過你從前拍的那些『老殘遊記』，於是，我告訴自己，我當自己是個樹洞，希望他們願意講心事。他們對你的尊敬，不是出於你是導演，而是你要自己賺回來，小朋友很簡單真誠，服你，咪同你講囉，唔服你，便用嘴巴摑你。」



樹洞的角色，延續到做後期時也是如出一轍。不難發現，電影以張婉婷第一身旁白貫穿，其實是剪片三年間無心插柳的結果。她拍了幾十萬個小時的 footage，剪了十幾稿，有些悶得發慌，索性把稿丟了再重頭剪過，剪著剪著，她索性將咪高峰放在剪接機旁，錄一些作為樹洞的心聲，「有時是未 roll 機前的補充，有時是自己的感想，有些是你見不到而我覺得有需要知道的，用聲音導航告訴觀眾。」

80年代時，她曾經為英國廣播公司（BBC）做助理和抄寫員，當時他們做的紀錄片是世界數一數二出色，而且專業而客觀，就當自己是一隻伏在牆上靜觀其變的蒼蠅。但是今次拍攝《給十九歲的我》時，她發現自己做不到那隻蒼蠅，「作為樹洞，聽了這麼多故事，有好多感受。」所以有別於傳統紀錄片持平的做法，她索性一邊錄旁白，一邊剪片，率性隨意，但不失溫柔，她慢慢發現，自己好像也在紀錄片裡參演了一個角色一樣，或許這是為甚麼電影處處流露一種溫婉的人味。



不自覺地反映時代 不要自我審查

張婉婷自1985年拍電影至今，多次執導反映時代變遷的電影，例如「移民三部曲」的《非法移民》、《秋天的童話》個《八兩金》，《秋天的童話》更奪得香港電影金像獎和台灣金馬獎。她現在回想，每齣作品都代表著她不同的階段，「雖然我不是很自覺地要反映這個社會，但是如海明威所講，沒有一個人是一座孤島。」80年代，她遇到移民潮，認識一些非法移民的遭遇，那時覺得自己做新導演，寫的故事很另類，但現在回頭看才知，都在反映時代的變化，「1989年拍《八兩金》時，第一次返大陸，國語又差，去跳舞別人用電筒照你，不讓有過多身體接觸。其後拍《宋家皇朝》(1997)，大陸進步了很多，到了《三城記》(2015)，你變到要幫她打工。」

那時，在這個不斷變化的過程，她突然很想將香港所有童年記憶記低，「因為不知道未來會怎樣，拍《玻璃之城》時未到1997年，機場又拆，我不知這個城市會不會變化到，皇后大道中會不會改名叫做人民大道中，我在港大的（何東）宿舍又拆，這個城市真的像一座玻璃之城，玻璃的反映都是瞬息萬變，不是永恆，所有東西都會變。」她那時有了一個頓悟，唯有記錄下來，才可以永恆地將它定格，即使拆掉了，它還是存在，「在菲林（電影）裡，有些事是可以永恆地活著。」隨著一個個階段的拍，一個個階段作記錄，香港人兜兜轉轉又在移民，而恰好她掌鏡著《給十九歲的我》，在拍攝2019年的社會運動後，少不免詰問少女們，要移民嗎？怎樣看香港？雖然問題與答案不至於很尖銳，但確實是一抹重要的時代印記。

要做到反映真實和時代，在如今的新香港，會不會是困難重重？尤其是《給十九歲的我》也有擺進2019年社會運動的片段和側寫！張婉婷卻苦口婆心地叮囑，「要憑著自己的良心去寫，不要自我審查，因為你永遠不會知道這齣電影會遇到甚麼，所以我只能用我最真誠的心，拍最真實的東西。」

她形容，《給十九歲的我》也是用著這個標準去衡量拍甚麼剪甚麼，2012年反國教運動和2014年雨傘運動都有些現場畫面，「因為當時少女們仍是『一嚕雲』，問不到太多，所以拍（現場）畫面為主。」但2019年他們的攝影拍不到重要的現場畫面，所以逐個女孩訪問，尤其是，其中一個主角 Madam 自小希望做警察，她的價值取向本身便充滿了戲劇性。大概真誠有它的本領，電影最後一刀也不用剪地通過了電檢，「當然，若不通過，



我們有想過其他方案例如畫公仔代替畫面……先拍吧，如果這樣不能拍那樣不能拍，甚麼都不用拍了。」

每個人都有個歲月神偷 好在愛電影

張婉婷年少在美國留學時，看了《教父》(1972)、《的士司機》(1976) 等等電影大開眼界，然後在唐人街遇到很多奇人奇事，豁然打開了內心的世界。所以她的世界並不是那麼非黑即白，殺手不一定沒有人情味，拍學生不一定要選成績優異，而更重要是，面對不少人認為，一班中學生如斯平凡有甚麼趣味，她仍是一往無前，「每個人都有個歲月神偷，你不要以為她們是好普通的一個人，每個人都有故事。」但是嘛，一邊拍一邊崩潰和沮喪，何必苦了自己？「有時拍拍下都好攞，經常諗，做乜我要拍電影做呢行，真係好辛苦，但好在我愛佢嘅，唔係我走咗好耐啦。」她試著描述這種患得患失的感受，「拍完，你又會好高興，竟然得，我個年代好少女人做導演，我又做到嗰，我記錄晒我想記錄的地方，你知不知道，巢皮棒（《秋天的童話》船頭尺的角色）今年過身了，唉，好苦，死好多人，但我都全記低了他們了，我愛的人、我的朋友、我的何東宿舍……」她的聲音愈說愈小。其實張多年伴侶兼拍檔羅啟銳今年七月也突然猝逝，如今在人前，她還是選擇精神抖擻地接受訪問。

面對近日的港產片小陽春，張婉婷也感到鼓舞，留意到，現在去大陸拍戲要拍主旋律，多了規限，所以換成很多新導演留港拍戲，「不一定要好大型的合拍片，小小地，適合香港人口味，都可以有幾千萬（票房）」。她打趣說，她都趁著這個機會拍些「好平」的電影：「我現在報答了我的學校，我都沒有很多個十年可以報答了。我將這些女生、學校的變化記下來，永恆地在我的記憶裡，希望也在觀眾的記憶裡。」

英華女學校的校訓是寸陰是惜，她和所有投放過生命的被拍者肯定，這十年都沒有白過。圖文：莫坤菱／攝：Nick